

中国近代之文运升降

王尔敏 著

中华书局



摄于 2007 年 1 月 29 日

王尔敏(1927—),当代著名历史学家,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。历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,台湾师范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。现居加拿大。

自序

中国文学数千年来所创辉煌成绩，在世界上传世之文学遗产言，足以超越各民族之成就，而领先世界。在此不涉其他学术门类，就文学而谈文学。苏曼殊早已称言，只有梵文与中文在文学上保持最高造诣，并亦批评其他族文学之平庸粗浅。但 20 世纪我学界文士却极其向慕欧西各国文学，一味仿拟，以为进步。回头则诅咒中国固有文学，甚至辱骂陈旧落伍，一味大力提倡文学革命。打倒之论，甚嚣尘上。而今一百余年，命也割掉了，文学提升如何？有待文界各家评估。

鄙人研究历史，对文学居于行道之外。只是既研治近代史，于近代中国之剧变，亦不能不参考同时代思想学术之演变。文学是一门代表时代最重要之学问，做历史交代，无法推开不论。向文家同道前徽，谨求谅解我外行人之鲁莽樛昧，竟敢对当代文运妄议雌黄。

我之粗浅犷野抡笔，扞龠向壁之论，自难中于方家绳尺，尚祈以外行人看待可也。

拙作奉呈学界，包括通论，含文章十四篇，敬求文界前徽批评指教。内容不及细述，而重点则偏离文学统宗，只讲通俗文学之兴起。动因起自于近代，而无论就史乘言，启动于外力冲击，就文学流变言，亦是更为复杂繁乱。我们后生晚学之辈，实有责任加以研判澄清。不揣冒昧，略作一些粗浅试探，未敢自许为著作。

做历史研究，中国历代苦难，人民死亡相继，颠沛流离，失产破家，饥寒交迫之世，要以西晋之亡，北宋之覆，南明之逃，为全民最大悲苦年代。但比之 20 世纪，在列强煎迫下之中国，受日本全面侵略，其全民之伤亡流离，饱受日军蹂躏，比之前古，严重百倍，实为有史以来惨绝人寰之悲剧。如今存于记忆，不能忘怀。然而中国人民

之艰苦奋斗亦是可歌可泣。史家亦不能辍笔。

我们俱知，20 世纪是国家动荡、外力横行霸道时期，亦是中华民族的忧患时期。文家难保安宁温饱，凡治学著文，无不在颠蹶喘息中进行，穷愁惶迫中运思。虽然极其艰困，所见抗日战争期间，遁避川滇之学者文家，若林同济、陈铨、雷海宗等，仍能维护中国文化，批斥西方文学、哲学、史学。今俱能一一覆按参考。我人应相信，中国自是拥有一流人才，以保证中国有复兴之日。

不过反思 20 世纪一百年间举国上下，我们不讳言，自古以来，国人是最无自信之一代。我曾有论证，不止一次说明我们是 1900 年起丧失民族自信心，我负责立此言，不在此重述。甚盼识家查证这一百年间学者教授文人议士之言论著作，何不作一番全面对比，用以驳倒吾之谰言。在此亦不暇细表。有太多文献可以查考。略举最近期之例，以供同道观览。

第一，香港小故事。

鄙人于 1977 年受聘，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。1978—1979 年间就传出香港英政府要对中文大学开刀整顿，名义号教改，冠冕堂皇，手段则是要迫使中文大学把四年制改为三年制。真正用心，浅说是要和香港大学体制取齐，仿香港大学之三年制。深一层动机，则是削除中文大学影响，一则坚持香港官方语言之英文，民间语言只能说粤语，不能说普通话（国语）。更重要是把中文大学废功，使之削弱影响。但最深处用心，是要加深继续统治香港，尽量使香港与大陆脱钩。也同时给香港人英国国籍护照，大约自命为英国人之香港而具英国籍者不下百万人。我在中大同事子女，向我儿女炫耀他们一家全是英国人，不是中国人。此事使中大头痛，决不敢违抗。不过一时之间一个包括几个学院之大学，人员教授以至于学课是无法说改就很快改的。一面因应，一面拖延，看来必须有四五年消化之过程方能达到。这并非中文大学拖术有成效，而是英国外交上为了香港主权治权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碰了钉子，就是港督麦理浩（Sir Crawford Murray MacLe-

hose) 去访大陆，试探英国之统治新界能否有延续可能，看他得意洋洋返回香港，其实却是发觉情势不妙，以他的力量，无法达成目的，而不免告知伦敦英廷，自外交上由高层下手向中国疏通。因是而展开外相贺维（Howe）向中国交涉续租新界之协商，终于也碰了钉子。英方为防避将来 1997 年中国收回新界，必会有大批具英籍身份之港人涌向英伦定居，于是英政府迅速制定新国籍法，把前许之英籍港民一概摒拒于英国本土之外。此时麦理浩已于 1982 年离职返国，换来新任港督是尤德（Sir Edward Youde）继续与中国谈判香港续租问题，不幸而累死在北京，任期终于 1987 年，可说是为香港治权而牺牲性命，却未能挽回英国统治香港之权利。到此则教改问题已不具重要性，可知只是政治把戏。

无论过去或未来，香港这一地方虽经英国统治一百五十年，须先要看其地人品民心是如何。我在香港任教十二年，所知港人在英人统治之下要分两个层次。主要是这里的居民有百分之九十七是中国人却是殖民地香港人。其中少数受英国教育者，任地方公职者，俱可归入识时务之俊杰，但各人志节不同，不便随便批评。其实大多数地方小民商贾负贩，引车卖浆，也有农民渔夫是人数最多。港人亦即是粤人，纯讲粤语。我在香港多年观察，深信粤人才是中华民族最吃苦耐劳、最坚强勇毅的一支，对于统治者可以听命却决不屈服，直到最后，仍称英人为鬼佬，称英国叫红毛国，愈是小民愈是如此，当然决不包括那些高级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在各级政府做官员之人，其中也必有学者教授。我因是向称港民为香港顽民，乃有感而发，非随便说说。

我做近代史研究，熟见 19 世纪，粤人卖猪仔，大批劳工赴南北美洲开金矿银矿，种烟草，特别是开辟巴拿马运河，修建太平洋铁路，往往死亡相继，十不存一，而以巴拿马运河之死亡最惨，达四五万之众。然而幸存者仍能在美洲各地开建 China Town，我到过夏威夷、洛杉矶、芝加哥和加拿大之多伦多、万古华、卡加利、艾蒙敦，

俱有 China Town，俱是先烈苦干经营，代表华工血泪血汗。内心肃然钦敬。

回头再看香港，亦是坚守中国固有文化，例如，新年各家供桃花和水仙花，其他地方俱早已不见，只有粤人重视而履行。我曾在岁末游观年花市场，通宵直到天亮，花市难以走完。

我也曾听人说道，香港是文化沙漠，此言过分，是假洋鬼子站在洋人立场看香港，像香港这样偏离大陆边缘，又仅仅弹丸之地，且又为英人长期统治，一般人照常理推断，以为是文化沙漠。其实其坚持中国文化比台湾和大陆俱强韧，可举一例为证。中国固有传统之诗，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已打入冷宫，做诗之人凋零，后继无人，大陆、台湾早已没有旧诗诗家，而香港连大学、中学均尚有做诗之人。今时已至 21 世纪，香港中文大学在 2007 年这样当代时尚会出版《香港名家近体诗选》上、下二册，证明传统旧诗，在香港尚具生命。我看大陆、台湾不能望其项背。须知此是长期英国殖民统治之地，有此存续之绝学，令人由衷钦佩。我深心祝望，中国之伟大诗学，能在中国复兴，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一大诗国。此在早先有周策纵先生主张中华诗国，而实自 20 世纪被国人自己糟蹋了。

在此并非专为香港卖好，样样只是多数善类，小老百姓则无不重乡爱国，知识分子则可说良莠不齐。知识越大心机越多，有良性自觉者，有名利熏心者，有忠实正直者，有投机取巧者。表面看来雍容揖让，看不出破绽。我在学界，阅历较多，稍有领悟，可称多彩多姿，不胜缕指。举其一例，以见其人，亦可测其对香港人心之影响。

香港地虽弹丸，除大部居民为单纯善良生业，吃苦耐劳之不屈顽民，而少数之知识分子，则是秉性学养、为人做事却是大有不同。自有英雄杰士、超卓群伦，亦有饱富学养之思想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、商贸菁英，亦是周旋于竞争世界而出人头地。在此不暇引举。但亦有不少趋炎附势、追逐名利，随世变起伏，力求趋吉避凶之高手。大抵皆是有高学位、高官阶之辈。我人能够觉察此类识时务顺潮流之俊杰

亦甚不容易。香港世变之大莫过于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即将结束其统治权之际。此时期人心与行径最能见出各样不同之行为动机。可以测出人心之浮摇，世风之乖谲。

我亦香港定居之人，90 年代，最能感受世变之乘，人心复杂而摇摆，尤其官员大吏、学者教授，最能反映繁杂乱象。这时有位在大学教中国史之名家，提出大文，题称：“无国有家，无家有我。”如果只是无名小辈，大可不论，而此位是在外国拿学位并绝对有能力到外国谋生之人，他虽是香港土生，做英国属民，一直是当地高待遇高名位之人，竟在此时道出这样一个理论，不但失其国家立场，亦放弃家族立场。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随国可去、随地可投有本领之人。如此大文推向本地学界与社会，给港人一个理论方向，一个具体示范。想想此一高文之价值就很可观矣。我之宣示此小故事，是要请大陆学界看看，他们是做梦都想不出如此之高论。那位教授现在仍住香港，究不知是无怀氏之民欤？葛天氏之民欤？

第二，台湾小故事。

1990 年代我回到台北中研院担任研究员。院长是吴大猷先生，很不得李登辉之倚信，乃至时生矛盾，台湾之政情无法从表面理解，本来政治重视现实，研究院却只重百年以后，全不对工。所在在此时期就把台北垃圾场改辟在中研院附近一公里处，看不到是有意还是无意。此使吴院长甚感侮辱，却无法争较。高人过招，凡夫俗子怎能参悟，但知吴院长有坐不稳之兆。可能在他 1991 年 4 月 16 日，在报纸上展示 6S，以见其弹射当朝大老，以泄愤懑之趣。S1 是 Superficiality，其旨是肤浅。S2 是 Stupidity，其意是愚蠢。S3 是 Stubbornness，其意是固执。S4 是 Selfishness，其意是自私。S5 是 Senility，其意是老迈。S6 是 Sans everything，原出莎士比亚，形容老朽昏悖之人。Sans Everything 乃是英国成语。吴院长六字真言，可谓高级戏谑。院里同事，有人又加两味。S7 是 Snobbery，其意是上谄下骄。S8 是 Slippery，其意是狡猾不可靠之人。想想那个老苍靶

子也是懂英文的留美博士，见到这样讥讽，岂有不生气之理。吴院长终于被挤下台，换上了李远哲接任。

李远哲是化学专家，取得诺贝尔奖金之后，名望日隆，声势显赫，自是意气风发，想有一番作为。回台问鼎台大校长一席，未能顺利得手。退而求其次，想接掌中研院。果然被李登辉引重，得以在1994年从吴大猷处接任中研院院长。上台宣揭抱负，果然出人意表。他心中如何算计，无法揣度。这要从他召集各研究所人员，一所一所逐次公开谈话中略窥点滴讯息。

他在任多少年，不须统计。因为自上任至退任只至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同仁谈话一次。虽然如此，在我所遇六位院长之中，要算第三位直接亲与各所研究人员对话之一位，只有钱思亮任院长时，是亲到每一位研究员研究室谈话。而李远哲则是一一到各所召集全体谈话。

李远哲凭恃其学术声望，信心满满，一开口即语出惊人，表明一己之国籍认同并不重要，鼓励同仁要做世界公民。声言他以前是日本人，现在是台湾人，那有什么重要，他未明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，而意思已透露出他这位名享国际的大科学家已经是世界公民了。信心满满地要同仁把眼光放远放大，不可拘于一隅。后来他也自美国引进一批世界公民，并推荐他们做政府高官，几位“教育部长”像吴京、黄荣村、曾志朗，以至杜正胜均到政府做“教育部长”。看看他之态度是如何的踌躇满志，他之鸿抱是如何之崇高远大，他之声言是如何之铿锵有力。我却看他是大言炎炎，错估了一个诺贝尔得奖人之固有身价。什么世界公民，全然自欺欺人，他到任何一国均须出示台湾“护照”，亦决无任何一个国家要重用他这些世界公民做大事，英、美、法、德、俄以至日本，未必会重用他。这些人只能来到台湾做大官，又要标榜高尚不凡，睥睨同类，没有台湾“护照”，到世界各地寸步难行。世界公民云乎哉。人太得意，不免忘形。至今多年来这批世界公民俱只鸠居台湾，别说西方大国，即是大溪地、千里达等国，也不会重用他们。

李远哲既经担任中研院院长，既须自知秉持国师地位，领导学术研究，以崇高道艺表率国人，以精湛研究与各国争胜。未料他扛着金字招牌扮政客之纲纪。举例说吧，号召全台学界六百人声援支持陈水扁选“总统”。那些打响的广告早公布报纸，李远哲之一言九鼎已成为一道选举灵符，一帖就中。此情已是蜜蜂分享苍蝇食物，完全忘记自己种性身份。

再举一例，陈水扁当选“总统”，在其上任后第一个新年元旦，要亲自上街为市民打扫街道，以实践其亲民诺言。当此之日记者镜头早已群拥准备，要留下美好纪事录，是时文武百官全部缺席，却有李远哲一人拥彗先驱，陪着陈水扁俱入境，播放全国。看来这位大学问家之一位“国师”，拥彗先驱竟至做到斯文扫地。看他得意笑容，似乎全然不知羞耻，真是令人纳闷。

李远哲这位国师，凭恃他诺贝尔奖得主之招牌，在台湾所做之最大事业，完全不在学术，他自信能插手教改，在台湾教育一门领域，从上到下，从大学到小学，一手操刀，大肆改造。乃有今时这样后果，动机有明有暗，自有高层上级嘱咐，内情亦是复杂隐晦，我人决无能力与资格妄下断语，留给教育家慢慢考究评估，实在不敢赞一词。至于表相所见大多为人所共识者，可以作如斯观点。世人俱知，李远哲这一生最具影响之事业，就是教改，虽然有高层使任，但俱由李氏操持，有充分条件与权力做下去。当然无论成败，他须全部负责，无有推诿余地。

同样因李远哲的维护推毂，几位“教育部长”，自是各展才能，而各人行事，亦无须由李远哲负责。不过一概俱对台湾教育之改变有不同影响。其中特以杜正胜任职最久，几乎超过前任院士前辈之总和，当然信心最强，行事英勇。此即在于以机关手段做出去中国化，去蒋介石偶像，他真是一位去中国化之急先锋。杜氏任内政声，俱有实绩实例，不须引举。把中国作为外国，孔子自是成为外国人，从教育入手，改造中小学教育。有一件看似不易成功，但却是有严重后

果。要去除中国文字，就要推行拼音，不是拼普通话，而是拼闽南语，拼音方式又要绝对不同大陆之拼音法。而用昔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所创之拼音。有位 19 世纪英国教士 Carstairs Douglas 在 1872 年所出之《厦英大辞典》(*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Spoken Language of Amoy*)，就是以西方二十六字母拼成闽南语。西洋教士即用此字汇在台湾传教，自然早有习惯。看来流行不大，好似难于通行。问题是在一个政府大力推动施行，并用于教育中小学生，此即易于生根而造成可观之后果。不要以为我危言耸听，可举真确史例供大家参考。明清以来，中国与越南关系密切，越人通晓汉语行之其民间。其国史用中文写，其文士能做诗，皆可参考朱云影教授之研究。最能作代表之例，是在 1881 年至 1884 年之间法军屡侵越南，其国官员阮述，到中国朝野进行求救，著有日记，香港中文大学陈荆和教授为之出版，定名《阮述日记》，其文笔典雅，造诣实深，可询陈三井教授听其评断。不过自 1885 年法国统治越南，政府禁用中文，要以拼音代越语为文字，上由政令推行，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法国虽无力再统治越南，而经此六十年间，已是法语及拼音方言流行，中文则完全淘汰。台湾做法岂不要步越南后尘？看看“中华邮政”要去掉中华，说做就做，不惜花大钱，要去蒋中正说做就做，亦毫不含糊。大凡操持政柄，大刀阔斧做去，小民只有坐待宰割。

第三，北京小故事。

我是久居海外，常在港台两地生活，对于大陆所生长故地，久疏六十年，知之不深，感受十分隔膜，自不能信口雌黄，乱编乱造，亦不可妄加猜测。今只就最近报纸所见，举证略为推断，亦决非无故放矢。

且说去年（2008）8 月，北京举办世界运动会，兴建一座具特色之鸟巢运动场，在接近完工之三个月前，有著名建筑学家信心满满地夸示，我们在建筑造型创新上会超越世界，特别大肆宣白将来要在北京建成一座世界最大之金字塔。我在海外，只有失望。想想看，以常

情而言，金字塔是什么建筑？是一种帝王陵墓，决不见有二用。建筑地俱在荒野穷谷，决不能建在京城。金字塔自是伟岸巨大，却是所有皇陵最丑陋者，比一比印度之泰姬陵，看是谁最高雅美观。这个建筑学家好心要把北京人纳入帝王陵墓，是要他们活着进去还是死后进去，都未加说明。若是要使北京人都享受法老王死后之荣耀，想他们一定会纷纷走避。如此荒谬奇谈，竟出于建筑名家之口，真是 21 世纪奇谈。现在 2009 年 11 月 20 日，加拿大有新闻报道，有一位名导演叫奈仁柏（Albert Nerenberg）宣告于明年（2010）6 月选在多伦多市中心地区（Bloor）举办世界大笑运动会（The World Laughter Games），要会合天下好手到此大笑，一分高下。不知运动场是如何样子，真是应该邀请这个建筑学家代为设计。想想能够使人大笑，亦将与建造金字塔是同样伟大。

从以上所举三个故事，全有事实根据，决不随便乱造，本人要负史实责任。

我个人治史心得，相信中国人丧失民族自信心，是起于 1900 年之八国联军打入北京，并签订不平等条约。历来对外屈辱要以此最重。想想平民百姓 不畏死，是不会惧怕。只是达官贵人士大夫实已吓破胆。主要列强要求惩处仇洋杀人之元凶，暗示就是慈禧太后，但由李鸿章交涉，在列国兵劫不解之威胁下，只能要求别伤害皇室，终而使端郡王载漪免死，罚为圈禁，而庄亲王载勋就须赐死，大学士刚毅本该赐死，他却在逃亡半路死在山西。大学士徐桐及其子徐承煜亦须自尽。刑部尚书赵舒翘已逃回西安，亦难逃赐死。此情震惊朝野，王爷、大学士尚书均不免以死抵罪，从此使一些做官人吓怕洋人，遂亦自此崇洋媚外。及到 20 世纪以降，国人软媚成风，连学者教授、文坛健将，也俱崇洋畏洋，回首自悔本国祖先所遗，固有文化一概鄙弃不顾，则以效法西洋为时髦。文风为之丕变，但凡古文旧诗，一概视为腐朽。而有一种全新文学代兴，亦是全国披靡。上举三个故事，是反映一种现象，决非一天造成，古人所谓：大风起于青萍之末，足

以形容始生之机，微而难觉，后世影响可成狂涛巨浸。现在所举，尽是学界菁英，表率群伦之士，已不相信有国家，要做世界公民，再加之中国化，用拼音文字代表方言，何须再有汉字。真是危机已现，中国之文化崩解，只是时日问题，真可慨也。我所敬信之文界高人得无有术以挽之？

何以一切要自 30 年代算起，盖自 1901 年以后，一段时间，国人正全神注意到，革命、立宪和保皇这类政治主义而无暇他顾。及至共和肇造，尚未多喘息，又闹帝制又闹复辟，亦俱在 20 年代扰扰攘攘，再加军阀混战十年，就已到达 30 年代，正是文人可以略静下来思考文化问题。须知到此年代，硕学宿儒多已谢世，甚至连王国维、梁启超，亦俱谢世。此际在打倒军阀，打倒帝国主义之下，一种打倒气势之流行信仰也就形成，在文化而言，开出个打倒之流行信仰，岂止是要打倒孔家店，但凡固有文化亦要打倒。

最可怕者，是流行之信仰会衍生更多流趋之流行错觉。比如说，流行打倒迷信、不要拜偶像，而衍生之流行错觉则要拉倒神像，毁寺庙，赶走和尚道士。无可以万千计之优美建筑被铲平，优美雕塑神偶被拉倒。乃是本国人破坏本国文化遗产之大行动，真是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（孟子语）。

当然，固有之文学艺术，亦不要继承，可另创新文学，开出一条新路。其实非新开创也，乃是模拟西方文学之路，重要信持，是委之于 Literature 所约制之规范，从事写作，大不同于固旧，则依西方之流变而随之起伏高下。到今追随已八十年，一切成就，皆有现成文献可供研考、评估、资证。有心人大可一为研究。

现在要提出的问题，是今日之文学流趋方向，是否仍继续追逐西方？是否要自主表现超越？劝我文界先知多加思考，并明指道路。

拙见并非投机取巧，主张追随文家前辈以投降西方为后尘。但另行开辟循中国固有文学规制，探索而恢复继承旧文学之写作，一定要脱去 Literature 之洋式规矩与戒律。二者并行，才是中国文学开展之

路。像是新文学，无论各界，俱已行用八九十年，我是完全不敢置词批评建言。对于固有文学，我自是久无亲接，又岂能置词批评？只是粗浅之见尚不揣冒昧，要提出两点浅见。

其一，中国是汉文文字宗主国，必须全力不惜代价标榜正体字为中国文字，并申报文化遗产。我看好繁体字，是以简速易学，尤其比英文省力。须知根据韦氏字典统计，今世之英文单字已超过一百万个，而中文最多不过五万余，而有四万余字是久不行用。学生要像汉代能识九千字，即能通用并能治学写文。鄙人相信，宜在童年学习汉文。我自己识字不多，而今已写书二十余种，并编书十四种，也足以做教授三十多年，深信学汉字不难。

其二，多少年来，我一直相信中国是诗教之国。但由我说出并不具分量。文学界中在美国有周策纵，他主张中华是诗国。又有台湾女作家，像是吴崇兰也是主张中国是诗教之国。这仍不过是一种主张，尚不具坚强分量，只有我是充分接受，仍是不敢大力宣扬。我既非文界中人，且对于大陆文界非常生疏，一定有不少诗家在继承中国诗，所知大师级之诗学名家，有钱锺书，我三十多年前拜读他所著《谈艺录》，应是70年代之事，他不但通熟唐宋诗，亦深熟明清诗。其书可以代表诗学著作。另一位诗学大师是钱仲联，他一生治诗，却最重视清代、当之诗。他少壮之年即笺注黄遵宪之诗而名噪文坛，其他工作最深厚之作，是为大诗人沈曾植的《海日楼诗》作注，随其年事日增，其注诗亦逾向前代推。故为鲍照、韩愈、李贺、黄山谷、陆放翁、刘后村之唐宋名家之诗笺，下推至明清，又注吴梅村诗，算来真可说是诗学大师（钱氏前六年以高龄逝世）。如此看来，可信大陆必有不少诗学名家。惟钱锺书、钱仲联俱当享大师宏名，决不逊于明清两代诗说诗话各大家。

虽然如上所言，而实则不能挽传统诗在20世纪以来之全面衰退，因为做古诗者急遽减少，80年代以后，几至于全无诗作问世。事有万不可测者，在中国旧诗几近消亡之期，在海外却有人出而为传统

诗建构诗学体系理论，向西方人传授中国诗教。此即当代诗学大家刘若愚（James J. Y. Liu）教授之一生投注于中国传统诗之研究，并建构一套中国之诗学体系。绝不同于古来之一切论诗注诗之旧槽。以其博通中西之诗材，而慧心建构纯解中国诗之理论体系。自 1962 年其诗学研究已经问世，历任香港大学、夏威夷大学、芝加哥大学，以至斯坦福大学汉学教授，专以讲授中国诗为专业。其所有专著，全以英文写出，精研专著有《李商隐研究》，有《北宋六大词家》（此书有中译本），而相关诗学最重要之书则为《中国诗学》（*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*），杜国清中译，1977 年印。另一本重要之书是向西方人谈中国文学理论，书名是 *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*，有杜国清等二种中译本。刘氏尚有研究中国游侠之书，英文之作，受西人推重。总之，其有关中国诗学之大著上举二种，俱是在中国研治文学之诗学上有开创新路之功。中国文界，宜加重视。诗不流于遽然消亡，刘氏功莫大焉，亦当推为诗学大师。

鄙人拙识刍蕘自己倾诉。余意又想向文界进告作一点促进之建议，亦非偶然凭空杜撰。乃是今岁收到好友（邓伟贤先生）相赠《香港名家近体诗选》上、下二册，系自 1841 年英占香港以来至 21 世纪，凡居港文家之诗作略选其要，每人不出十首，而合成一集。此在荒乱末世极难得搜集之贡献，尤其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一百五十余年，而尚能见诗学传承，真令人肃然钦敬。此中港人何文汇自是重要推手。何氏高才博学，精通中英文，乃吾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同事，后任大学教务长、讲座教授，其人多才多艺，曾多次上演电视剧，吾曾欣赏其所演风尘三侠之李靖，真是一表人才。惟在英人殖民统治之下，坚守中国固有文化，大力维护传统诗学，其以微薄经费，小局面创办每年一次之近体诗作选奖，已办有十余年，正见其沉毅勇任之志节，实深钦佩。吾今从之启动灵感，像香港弹丸之地尚能极力维系文学诗学之绝绪，中国版图如此其大，万倍于香港，何不每年举行征选文学作品，以为提倡，扩大征集，每省每年举办新文学征选一

次，旧文学征选一次，大加提高奖额，以鼓励作者，各打分自完成，并给奖，再将优胜者之作品汇送文化部，由文化部汇集全国来件，再商聘约名学者审评各门分选若干，再给大奖。最后合各省之作品，胜与不胜，概予出版，定名“2009年新文学征选集”及“固有旧文学作品征选集”二种，用以年年举办，年年传世。似此可为一种发展文学之路，冒昧陈词，真是不胜惶恐惴惴之至。

拙著将由中华书局出版，今已呈稿签约，欣幸之至，不免造言妄议，尚祈识者不吝指教。

2009年11月28日

写于多伦多之柳谷草堂

通 论

今世学科分类至为清晰，本人一向治史，于文学自是外行，何以要写此书？对己须有慎思，对人须有交代。

我虽生在学术分化时代，早远离晚清以前，特别是清代二百余年中国学者之博通风习，所履践治学途径，则是近七十年来之学术分工，必须循专精之道。于是所选专业，全投注于治史。因求学时同时兼治地理，而地理亦成为相辅之兼长，如此而已。

治学之幸运与否，在于得硕学大师之调教，我个人列居史学大师郭廷以先生门墙受教。他专精近代史，却一向具博通古今之学养识力。我学其春秋家法，自身敢称长于年代学，惟师门教训，亦要求我辈要兼通文学与哲学，不得谓之为博雅，却决不可荒疏文学哲学修养，此是入门必循，尚不得谓尽符夫子期望，只是做到打基础而已。

我虽是还说得重视文学哲学，而个人专业要求，怎可须臾离史学，倾我才智，亦仅只在史学一门讨生活。因是生平著作俱集中于中国近代史领域，亦有一本书论述古代，想到生平功力俱用于治史，未敢旁涉至文学门类。

我之能够接触文学论题，明确被动在谈论思想史受到一些求知的迫切起意。当我在 60 年代撰写晚清政治思潮之动向，看到甲午对日战败，对国人刺激既深且广，此时人人惊觉到亡国灭种大难临头，于是先觉之士奔走呼唤，要唤醒全国危亡意识，共谋自救。于是自然启导三个思潮动向，迫使我选择探讨，其一是大动向，走上平民教育努力；其二是改良简化文字，供平民快速识字；其三是推广通俗文学，使之灌输爱国救国思想。此三个论域，我选其二、其三各做一文，今已收入本书，使我不期然走进通俗文学领域，走进国语运动领域，说来俱是文学领域。为时已到 80 年代，是我在香港任教之时从事此类研究。接着又扩展至

《点石斋画报》，一步一步被引进通俗文学。

当我处理《点石斋画报》，发现现代文学名家很是鄙视拒斥，读鲁迅之评论可知，极度诋毁，毫不留情。惟我看法不同，自有所见，必冷静细绎，就事论事，一切探讨清楚，赋予通俗文学地位，充分抒发其特殊之点，与文家持论有天渊之别，收入本书二篇，敬祈方家指教。

我在 60 年代已在阅读《申报》（学生书局影印），丝毫未能留心创办人美查兄弟（Frederick Major 与 Ernest Major），抄录一些资料，也把眼睛看坏，几乎失明。手中资料，未尝一用，却耐心等待有使用之一天，及至我研究《点石斋画报》，发现美查才真重要，要在世人素不理睬之地填补史乘缺忽。因为美查兄弟在中国实对通俗文学给予发展生机，因而撰文述论，收入本书，只祈同道者一为检阅。

为了研究美查，必须翻检《申报》，四十年前所抄资料，至此可以引入文章，重点在于我所抄当年《申报》刊载之各家《竹枝词》，再进而广泛阅读当代文家所编之各样竹枝词选本，进而得以选择撰写清人之海外诗草，至此方可算是接触到文学论域，已收入本书，敬求文家教正。

我在多次文章论述美查，终须严肃对待，将美查提升至中国近代小说文运之兴起论旨中占重要位置，未免惊世骇俗，难免要受到文家拒斥，十分冒险。只是我要决心探讨，不计成败，不怕责难，但祈能拾遗补缺，使治文学史、小说史者可以借手采择补充。此文收入本书，惟祈识家教正。

我向文家讨饶，是我竟然真的跨过行讨论起小说来，二十年前我确是发表过一篇探讨公案小说之文章，一定触犯文家规矩，尤其治小说史者，定为之侧目，此文亦收入本书，等着接受批评。

90 年代初，我写一篇涉论王韬之文，无关于思想政见，却只谈其诗、文、酒、色，以见其风流至性，也能见到王氏生平最得意之际会。尤以游访东瀛，备受礼遇崇重，是其生平得意之高峰。收入本书，用以